

《切韵》的全浊声母和 客语的送气清音

蓝小玲

作为汉语一大方言的客家话，它的读音有一点很引人注目，那就是《切韵》的全浊声母不论平仄它都读为送气清音，从赣南、闽西至粤东、四川、台湾，所有客语区都相一致，这是人们早已了解的一个特点。但是，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浊音清化送气”这一特征并非客语所独有，在北方话中，如山西、河南、湖南、安徽、江苏等地，还有在粤语中，在赣语、闽语中，也都有这一现象存在，那么，应该如何来认识这一问题呢？本文即试图说明“浊音清化送气”可作为客语的特征之一，探讨浊声母的读音与演变。

首先必须指出，除了客方言，其余的不论是北方话、吴语、闽语，还是粤语、赣语，都不能说是一致存在这一特点的。这“一致”既可理解为指所有次方言，也可以理解为指《切韵》所有浊音字都读为送气。《切韵》全浊声母在各大方言中的读音是：吴语湘语均为不送气；可以平仄来划分界限的有闽语，古全浊仄声在闽语都不送气，全浊平声在闽语一部分送气，如“头”、“糖”，另一部分为不送气，如“投”、“堂”；粤语是介于客语和闽语之间的，它的平声都送气，仄声只有少数白读为送气，如“弟”、“淡”、“重”等，可见它的送气字较闽语多，但在整个音系中，浊音仄声头气还不是主流，也未见有什么规律，看来并不是它的基本特征。需要说明的就是北方话

和赣语了。北方话还有少数地区浊音的仄声也如客语读作送气。笔者曾调查过河南灵宝县方言，全浊声母今读一律送气；山西省闻喜方言，也同灵宝方言读作送气清音；（王洪君《山西闻喜方言的白读层与宋西北方音》《中国语文》1987. 1）苏北南通、泰州等地也有此特点。（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而赣语的浊音送气比北方话更为一致，范围更大，这是否意味着，“浊音清化送气”不足以作为划分方言的一个标准，或者说，它并不是客方言的特征之一呢？

要弄清这一问题，必须将客方言的特殊形成历史考虑在内。据前贤考证，客家来自中原地区，唐末宋初为避战乱而大批南徙，如此，中原客先民旧居地就是客家的“源头”了。客先民迁至南方后，客家群体与中原旧地的北方人群体就成为互不交往的两个群体，他们原先共同使用的语言（这“共同”当然是相对而言，不能排除原有一些方言差别），一被带至南方，一仍留在旧地。南北汉人的语言自那以后就依照各自的方向、速度进行演变，逐渐成为两种不同的方言。“方言的形成是由于一种语言分裂成地方片断之后，就不能在所有的片段里顺着同一沿流流动。我的意思当然是说它不能顺着绝对同一的沿流流动。一种语言的总沿流有它的深度，表层的速度比较大。某些情节上，方言分流得很快，正说明这些情节在语言本性上只占比较非基本的地位，不比变得较慢的情节，那是远在方言已经变成互不相识的形式之后还能共同保持下来的。”（萨丕尔《语言论》）萨丕尔强调语言中的基本特征会被努力保持下来，哪怕这语言已分裂成方言。因此，尽管南北汉人已分成两个群体，时间与地理的因素使他们所操的语言演化为两种方言，但原先的“基本情节”却完全可能被保留下来，从目前已掌握的资料看，这“基本情节”就只剩下“浊音送气”了。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客语和北方话各自演变的结果，是偶然的巧合。但这并不是最好的解释，正如霍凯特所说的：“互不来往的两群或两群以上的人们不可能作出相同的发现或发明，也就是所提到的‘特征’不可能平行地产

生。”(霍凯特《现代语言学教程》)上文提到的河南灵宝县,旧属司州弘农,是客先民居地之一;山西闻喜县则属晋南,在上党的西南方向灵宝的西北方向,应属客先民居住区域;而苏北南通、泰州也与客先民居住区域地理相连。客先民离开旧居地已有上千年之久,到达闽粤赣也至少七、八百年了。在时间与地理都分隔的情况下,要想“偶然”地平行产生这一特征,内部又是如此一致,实是极不可能的。笔者认为这是它们原有的基本特征的共同保留。

那么,赣方言的浊音送气又该如何解释呢?袁家骅先生在《汉语方言概要》中对赣方言所作的说明是特征不很突出,分布的疆界不很明确。单从描写研究上着眼,江西南部可以叫客赣方言,湖南江西二省相邻的县和湖北东南角可以叫湘鄂赣方言。以南昌话为赣语代表,它的词汇似乎更接近吴、湘、江淮诸方言,而与客家话并没有特殊的亲密关系。罗常培先生倾向于以浊音送气这一特点将客赣两个方言划归在一起,而这一特点在湖北八县(划归赣语)中只有四个县符合。因此袁先生认为:“方言间语音的相互影响和渗透是可能的……必须找出历史发展的线索,说明两个方言的确经过一个共同时期,才能算是同一方言的不同分支。”笔者认为,赣语的这一现象是受客语的影响而形成的。我们知道,两个群体只要互相接触,就难免引起语言上的交互影响,而这影响还往往是单向的。客家的三次迁徙,都与江西发生过关系。从时间看,与江西的关系有上千年的历史,客先民一批批的来到江西、经过江西。在这样漫长的岁月中,在如此密切的接触中,来自当时政治文化中心的中原人民的语言特征在江西一带被传播、被吸收,也是不足为奇的。“语音或者发音上的某些特殊方式,有在连成一片的地域上散布的趋势,有点象文化的因素那样,从一个地理中心幅射出来……在语音方面,一种语言主要关心的是保持它的语音格局,而不是个别声音本身。那么,就没有理由说它为什么不可以无意识地吸收已经钻进了它的不同程度的个人变异里的外语声音,只要新变异(或

加强了旧变异)和本地的沿流方向一致。”(萨丕尔《语言论》)笔者认为,浊音读送气清音的特点是第二期客家所遗留下来的。比较可能的是,唐末宋初浊音已开始清化之时,客先民离开了本土,而在吴楚方言区,部分方言也正要开始这一演变。当客先民来到这一地区后,浊音变送气清音这一变异形式就在江西地域散布开了,江西当地方言,包括与江西交界的湖南平江、浏阳、醴陵等地的方言,甚至包括湖南东部的好几个县(客家经过之处)就吸收了这一特点,浊声母清化为送气。这个新变异与当地浊音清化的沿流方向是基本一致的,而吴语和长沙等湘语则按自己的方式演变。至此,赣语才以语音接近客语,词汇接近吴语的形式显露出来。正因为赣语的浊音送气是这样形成的,这一特征在赣语内部就远没有客语内部那么一致。如江西修水方言古浊音读送气与次清声母合一,但音值却是浊音,在安义县的老年人中也保留同一现象。(万波同志提供)再如德安方言古全浊声母今有读[b-、d-、g-]一类浊音的,有读送气的清音浊流的,还有读不带浊流的送气清音的,同一字可能有时这样读,有时那样读。星子方言古次清声母今有读浊音的,也有读送气清音浊流或送气清音。(颜森《江西方言的分区》、《方言》1986. 6)尽管这些方言的清浊并无音位对立,我们却可以从中发现一点江西地区早期方言的痕迹。当这些方言接受客语的特点,将浊音与次清合为一类时,原先的特点却也并未完全丢弃,于是有的方言将浊音的音值保留下来,当然保留的程度各不相同。在赣东北地区,属赣语的景德镇与乐平的方言浊音读送气清音,而属徽语的婺源话古全浊促声读送气,而舒声的送气却仅限于从母,如“坐”、“在”、“象”等为送气,“道”、“盘”、“群”、“近”等则不送气,(叶祥苓《赣东北方言的特点》、《方言》(1986. 2)浊音朝两个方向演变。这是因为它未彻底接受客语的特点,客语的影响到这里只剩一个“余波”,只有入声比较彻底,浊音与次清合为一类。从浊音送气在江西等地的不同反映,可以推测客先民入赣的聚居地和迁移的大致

路线。

总之,现代汉语方言中,浊音送气这一很突出的语音现象不是在山西、河南,在江西、湖南、江苏,在客方言区各归各地演化出来的。这种平行的现象说明河南、山西、苏北等地某些方言与客语在历史上是有关系的,它们本是同一方言或极为接近的方言,这一平行现象与客家迁移有着密切关系。而江西、湖南等地的这一语音特征则是受客语影响而形成的,这些地区是客家南徙的中途停靠站,客语的特征在这些地区扩散。由于这一音变并不影响这一地区方言的语音沿流,于是就为它们所接受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应该把“浊音清化送气”作为客方言的特征之一。它不但不会使客方言的面貌不明,界线不清,相反,我们可以它为线索,弄清客方言和其他方言的关系,找到客方言的“源”、“流”及客家迁徙的大致途径,它还能在民族迁徙对语言的影响这一问题上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当然,“浊音清化送气”只是作为客方言的特征之一,而不是唯一的特征。如果只用一个特征就能划出某一语言或方言,当然是很理想的,但实际却不易做到。薛凤生先生给官话拟了十条测验条例,作为一个方言是否属于官话的检验标准,按其重要性定下顺序。对于应该用几条标准来划定官话界线,他作了如下说明:“人类的社会活动是复杂多端的,当一个地区发生了独特的音变而形成方言时,该地区的人民与其他地区的人民仍会有或多或少的接触。该方言的特色可能渐次波及其他方言,其他方言的特色也可能波及这一方言,方言学中的所谓波浪式理论就是根据这个现象提出来的。因此,在讨论官话与非官话的不同,就不可能只用一条规律把它们区分开来,而必然涉及好几条规律,用这几条规律的总和而不是其中的某一条作为官话的特性。换句话说,这几条规律中的某一两条可能也影响到了某些非官话方言,但只有官话才包含这些规律的全部。”(《北京音系解析》)薛先生认为官话应包括这十条标准的前六条。如此,将客语内部非常

一致,而在其他方言中都不能囊括全体的“浊音清化送气”这一特点作为客方言的特征之一、作为划分客方言的基本标准之一,是完全可行的。

附带说明一点,“浊音送气”这一特点到了闽客交界地带就不那么整齐划一了。闽西清流县的灵地乡和连城县的姑田乡都与永安县(属闽中方言)毗邻。灵地方言的浊音清化后几乎都读作不送气,如“茶”、“甜”、“前”、“大”、“白”等,唯有个别读作送气,如“舅”。姑田方言的情形更为复杂。平声、仄声均有送气与不送气两类,如“茶”、“跪”、“毡”为送气,“铜”、“丈”、“直”则不送气,不送气字多于送气字,看来没什么规律。联系中原汉人南迁的历史,我们可以推测,这些地区在客家尚未到来时居住的是闽人,说的是闽语。当客家进入闽西后,此地区方言为客语所覆盖,闽语即被排挤了,但是仍有某些特征沉入边缘地区的客语底层。于是在这些地区,客语的极端特点浊音送气就被磨灭或部分磨灭,由此即显示了闽语的一些形迹。这种形迹保留的程度和方式在不同地区并不完全相同,这就出现了灵地和姑田那样的并差异。当然,不仅从语音上能找到这样的遗迹,词汇方面如闽语的“箸”(筷子)也出现于客语的边缘地带。

在说明了浊音清化送气是客家南迁前即已存在的共同点,后来南北两地都把语言中这个基本特点保留了下来之后,需要进一步阐述的是,在唐末宋初客家二次大规模南迁前,在客先民居住区域,全浊声母的读音及它的演变。

根据现今已掌握的资料尚无法直接解答这一问题,但我们却可以客先民居地的周围地区的方音为参证,推求全浊声母的读音与演变。在一个地区内,分歧的语言在形态上都可能会有许多相似之点,这是原来的共同类型和共同语音质料的遗迹,那么,在一片相连地区,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就更可能存在一些共同点,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两种方音作为参证:1、唐五代时西北方音;2、宋代西

夏方音。关于第一种，罗常培先生的考证基本可以回答这一问题。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以四种敦煌藏译汉音的写本《千字文》、《金刚经》残卷、《阿弥陀经》残卷、《大乘中宗见解》和保存方音性的汉字注音材料《开蒙要训》来考求唐五代时的西北方音。罗常培认为，几种敦煌藏译汉音的写本大概都是吐蕃占据陇西时代为学习汉语的方便而作，应该是唐代宗宝应二年（七六三年）至唐宣宗大中五年（八五一年）之间所作。从发现的地域看，它们译写的语言似乎是沙洲或沙洲附近流行的方音。这沙洲即今敦煌。第二种方音的参考资料是西夏文辞典《文海》，它所反映的是宋代西夏地域的方言音系。西夏地域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和甘肃大部分、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青海东北部，这一地域大致在客先民居地的西部。甘肃武威有大量西夏时期文物出土，根据客家一些县志的记载。部分客先民即出自武威。虽然这些地区并非客先民的居地，但与客先民居地由西向东地理大致相连。如此，这一地区在唐代至宋初时的方言语音系统与客先民所操方言完全可能存在某些相同之处，把它们作为参考资料来研究客先民居地的方言，应该是可行的。

罗常培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根据敦煌汉藏对音材料考察了唐五代时的西北方音，其中有对全浊声母的说明：

“在《千字文》、《阿弥陀经》跟《金刚经》三种藏音里把并、定、澄、从、群译成 b、d、j、dz、g。从写法上看起来好象全浊声母在唐代西北方音里应该读作不送气音似的。然而藏文的浊母因为方音不同本来也有送气与不送气两种读法，所以单看字母不能决定它怎样读。幸而在《大乘中宗见解》里全浊声母的字除去奉母的‘凡梵’、定母的‘怠道第大地盗定达’、澄母的‘着’等十一字以外，其余都变为次清。我们得到这个时地相近的有力旁证非但可以不再犹豫就决定其他三种藏音里的全浊声母应该读作送气音，并且全浊声母一现代西北方音跟大部分官话里所以平声变次清、仄声变全清的现象也可以得到解释了。……上去两声所以不完全变成次清一

定是送气的成素受声调的影响渐渐变弱的缘故；并且《千字文》跟《大乘中宗见解》里的全清上去声所以同全浊的去声字相混也恰好可以拿同样的理由来解释：可见全浊平声变次清、仄声变全清的趋势从那时候已经开始。假如这个解释不错，那么我们就可以承认全浊声母本来是送气音，在现代吴语跟客家语里保留它的遗迹比较多一点儿。”

罗常培这段话总括了几点：1、全浊声母本为送气；2、全浊声母清化的趋势在唐代已经开始，平声变次清，仄声因声调的影响，送气成素变弱，因而混入全清；3、客语和吴语保留的古音特点较多。

在《切韵》的音韵系统中，声母有清与浊的对立，清音有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浊音则无此对立，当然在记录时就只需记作一组，如 b、d 等。至于各地的实际读法，送气与不送气的两种可能都存在，其实这就是方言的分歧。方言的分歧“是从不知什么时候以来在语言的历史中一直有的”，（霍凯特《现代语言学教程》）尽管原始方言差别是怎样来的，现在还不能清楚地解释，但我们知道，在原始条件下，政治群体受地理因素局限而被隔离，当群体被分隔达到了一定的时间，方言即可能产生。“一种语言能在广大地区通行而不孳生方言，是极端可疑的。老的方言一经妥协而被磨平了，或是由于一种文化上占优势的方言的传播而被排挤了，立刻就有一群新方言起来瓦解这拉平作用。”（萨丕尔《语言论》）古代的汉语也与其他许多语言一样，存在着方言的分歧，扬雄的《方言》，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全浊声母在有些地区送气的成素较强，清化时，送气仍保留，就被归入次清声母中；而在另一些地区，送气的成素较弱，清化时，只在平声保留送气，仄声则不送气。

以上是第一种资料给我们的启示。

至于第二种资料——宋代的西夏文辞书《文海》所反映的则是宋代陇西和客先民居地之间的西夏王朝统治地域的方音，它的年

代较晚,此时浊音已经清化,它能给我们提供全浊声母清化后的读音。王洪君的《山西闻喜方言的白读层与宋西北方音》一文将黄振华在《文海研究》一书中系联出的声类及部分韵类与闻喜方言作比较。他的推断是“宋时我国西北地区和山西南部的方言同属一个系统。这一音系比《切韵》音系简单得多,它与今西北方言,晋南官话有明显的系统差异,不可能是这些方言的前身。”笔者认为,客先民所操方言与这一系统有着某些共同点,不但闻喜方言与《文海》的音系可以作比较,就是客方言也可以《文海》作为参证。

西夏王朝是党项族于十一世纪初(一〇三八年)建立的,一二二七年为蒙古所灭,前后历经一百余年。党项族建立了西夏王朝后,由夏景宗元昊和野利仁荣等创制了西夏文。在西夏时期编纂的多种西夏文字典中,《文海》是最全面、最系统的一部,成书年代约在十二世纪中叶。《文海》仿照《广韵》,收字按韵排列。黄振华根据《文海》残存的平声 97 韵的反切上字系联出的《文海》声类系统是全浊声母与次清声母可以互切,合为一类,全清声母自成一类。例如,在齿音中,“迹脊祖子积且则足卒贵”为一组,而“妻寸醋齐苍嚼蛆贼集绝”为一组。这表明宋时西夏地区全浊声母已清化,不论平仄均读为送气。此时,客家大规模南迁刚过不久。“宋时流行在西北及晋南地区的方音不知什么原因逐渐消亡了,它原有的领地逐渐为其他方言所覆盖”,这是王洪君在他的文章中提出的疑问。笔者认为,这消亡的原因之一应该就是客家的南迁。操这一方言的客先民离开了本土,浊音送气的特征在他们的方言中仍保留着,而在北方语区它则只是个边缘形式了。

另外,周祖谟先生也根据韵书、字书、音义书、敦煌变文、唐代的汉藏对音材料等研究了唐五代的北方语音,得出的结论是:“从书音中有以全浊仄声切全清和以全清切全浊仄声的例子来推测,北方音的全浊声母已开始清化的倾向……唐人李肇《唐国史补》卷下有一条说:‘今荆襄人呼提为堤……关中人呼稻为讨,呼釜为

付。’这也就是浊声母变为清声母的例子。（周祖谟《周祖谟语言文史论集·唐五代的北方语音》）

这清浊互切的现象以及李肇的记述，在声母方面给了我们两点启示：①在唐末，浊音已开始清化；②读作全清或次清，各地并不一致，如荆襄读全清，关中读次清。现今关中方言还留有“呼稻为讨”的遗迹，在白淙洲《关中方音调查报告》中，“稻”读送气，五十个方言点都一致，另外，“坐”、“浊”也有十几个方言读为送气。根据《调查报告》来看，浊音送气保留得比较多的为蒲城方言，“地”、“在”、“匠”、“淡”等都为送气，蒲城县在河南灵宝县西北方向不到二百公里。关中方言保留浊音送气的遗迹正与历史的记载相吻合，它将客先民居地和西夏地域连在了一起。唐末至宋代这一时期这片地区的方音一定的有一些相同点的，其中之一就是浊音送气。现今客方言也恰有“呼稻为讨”的（声调亦同），多在闽西，如永定、上杭、武平等方言。

由此可推测，唐五代时期，西北、关中至客先民居地这片地区，浊音开始清化，按[b'-]变[p'-]或[b'-]变[p-]的方式演变，浊音的送气成素较强的一律变次清，如客语类，送气成素较弱的则平声归次清，仄声变全清，如北方类。不论浊音原本送气与否，它们的演变都是一次完成的，如果它们都曾先经历一个中间阶段（如客语类先变全清或北方类先全变次清），不是一次完成这一演变，那么清音和浊音的界限就被打乱了，再往下一阶段演变时，就难以维持原有的格局了。如假定客语是由[b'-]这[p-]再变[p'-]，则“鼻”、“伴”、在清化后就先与“比”、“搬”或“痹”、“半”合并而同音，那么，再由不送气变送气时，“鼻”和“比”或“痹”、“伴”和“搬”或“半”就无法按照《发韵》系统来分离了，原有的清浊界限此时即被打乱。现在的事实却正相反，故此推测它们都是一次完成这一演变的。

这种浊音清化送气是在北方部分区域的一种共同变化，演变结果在客家二次大规模南迁时被客先民带到了南方，此后，作为他

们语言中一个本质特征,代代相传,保留至今,成了客方言的一个显著特征。而在客先民居地和它附近地域,则只有灵宝、闻喜、南通等少数方言中,或是如关中方言只有个别基本词中还能找到这一历史遗迹。“两种语言由于它们有共同的过去,会保存着若干可以证明它们的亲属关系的特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两种方言亦如此,在“共同的过去”中形成的占基本地位的特征,变化是相当缓慢的。虽然现今客语已与灵宝等方言已经是两种互不相同的方言了。但它们还是以“浊音清化送气”这一基本特征向我们显示了它们“共同的过去”。